

奇怪建筑来自“官员干预”，这话对了一半

刘畅

有媒体盘点各地冒出的奇怪建筑，将其归结为“官员干预”，并痛斥为“权势地标”，将设计师说成是官员的“画图工具”。这种说法酣畅淋漓，直打胸膈，说出了问题的痛点，但却过于简单。很多奇怪建筑产生的初衷和目的，就是要成为“地标”，结果，有的城市左一个地标，右一个地标，还要每年不断冒出“新地标”。

地标，就是标志性建筑，是一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鲜明标识。近年来，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各地高楼大厦平地拔起，一座座城市在迅速“长高”。从南到北，建筑风格千篇一律，城市文化差异逐渐消失，已成经济社会发展的通病。因而，一些地方官员热衷于“地标”，不停追求“新地标”，是一种思变求新的心理。具体表现为，在城市规划和建设审批上，他们鼓励奇怪建筑，一味追求建筑的新、奇、特，更多奇怪建筑应运而生。

然而，认真观察这些现象，就会发现，奇怪建筑又不仅仅是“长官意志”的结果。在设计、招标、投标过程中，很多重要项目，都有专门的委员会负责，还有专家评估和评委投票，最终中标的设计方案往往经过多轮讨论，甚至还向社会公开和公示，地方主要负责人的拍板固然重要，但也少不了方方面面的支持和配合。由此造成了一种现象，一旦这个项目遭受批评和诟病，媒体总是把矛头指向主要官员，实际上，奇怪建筑遍地开花，还有更

深的社会现实和普遍心理因素。

一个社会现实是，近年来，经济飞速发展，很多城市重点工程、重点项目建设，都出现了“不差钱”的局面。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主导者想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不希望节俭，反而希望多花钱，仿佛他们手里产生的不是建筑，而是“丰碑”，是未来数十年里津津乐道、引以为荣的“发展标志”和“进步象征”。因此，设计投入大手笔，追加建设投资在所不惜，使得奇怪建筑有了“经济保障”。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全球的设

计师都比较青睐中国，都希望把自己的设计方案拿到中国来一展身手，由此也让中国的很多城市成为世界新奇建筑试验场和全球最新建筑展览馆。

还有一个社会心理是，很多人对“现代化”的理解过于片面，对未来社会发展认识出现了偏差。以为现代化就是没见过的，老的、旧的、见过的，统统不是“现代化”。这一认识，还表现出一种“反传统”的倾向。古建筑明明白白的，就觉得十分“落后”，没有“现代化”的风貌，怎么办呢？首先将其拆掉，用

新材料原地原貌重建，加装上玻璃墙，一下子就让“古建筑”充满了“现代气息”。对于新建建筑来说，更是如此，在广泛的设计征集、招标中，明明有专家委员会，各个方面的人才精英云集，决策者拿出意见之前，让专家投票，也往往是越新、越奇、越特的建筑设计越能胜出，看似平淡、守旧的设计方案最先被淘汰。可见，对“现代化”的片面理解和过分迷恋，并非个别现象，而是需要普遍扭转的思想认识问题。

奇怪建筑劳民伤财，真的无需再搞了。但在城市千篇一律和奇怪建筑产生的中间地带，如何更好融合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让每一个城市变得有品位、有文化、不庸俗，却是一个大课题。改变奇怪建筑，就从改变追求新奇的政绩观、现代观、建设观开始。

如何算清车改这笔账

本报记者 王亦君
实习生 高颖

再过两个多月，中央和国家机关完成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期限将至。

据媒体报道，9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主持召开了中央和国家机关车改改革动员会，全面部署中央和国家机关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

7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

距离方案发布已过去百日，车改正在推进，今年年底前，各地要制定并上报车改总体方案。

记者注意到，《改革方案》公布至今，有关进行改革的公车范围、车改后究竟能节约多少开支、发放车补会不会演变成“变相福利”等问题广受关注。

近日，中央车改办回应了这些质疑。就相关问题，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一些长期关注公车改革的专家。

车改之后花钱更多？

前不久，某媒体一篇“某县公车取消减千万支出需发四千万车补”的报道引起广泛关注。报道以“湖南北部某贫困县”的情况进行测算，称车改不划算：“一般公务用车加起来也就100多辆，按照中央车改意见，即便全部取消这100多辆公车，一年可减少上千万元的财政支出(包括司机工资、车辆维修等费用)，但同时得拿出近4000万元给全县7000多名公务员及按公务员管理的事业编制人员发放车补。”

中央车改办相关负责人随后对媒体表示，这一报道对车改政策理解有明显错误。按照车改政策，车改方案分级负责，各地确定补贴标准的前提是：改革后的公务交通支出必须低于改革前支出的总额，这也是

车改的政策底线。

长期关注公车制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专门撰文分析，从“某县”来看，原来有人认为，“某县”的公车只有100多辆，经过媒体调查实际上是370辆。原来说的拿车补的公务人员有7000多人，实际上只有3000多人，大多数人的车补仅有500元多一些。

按照每辆车折旧、司机、运行费等加起来算10万元左右，车改之前是3700多万元，车改之后发车补1500万元，加上执法车、机要通信车、极少部分领导的实物保障车按照50辆来算，也应该不会超过2000万元，大体上与财政部科研所原所长贾康“车改节约50%”的估计相吻合。从浙江杭州、温州、江西新余等地车改情况来看，即使把处级干部的车补定在2500元~3100元，正科级1000元以上，车改也可以节约25%~35%。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研究员沈荣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衡量车改后是否实现节约目标的原则就是，取消公务用车后，原来用在公车上的支出，减去车改后的车补，有结余才是节约。原则上车改后比车改前的费用要低，但是也可能车改刚进行的一段时间内费用会反弹。方案刚出来时，对相关公车和人员还要处理，有的还没处理完，这个时间内的公车开支还存在，车补也已经发了，这两项支出都存在，就可能出现在某一段时间内的费用高于车改前。

究竟有多少辆公车

叶青认为，一个县的公车有三大类：一类是“编制内的”，或者说是“体制内的”，在财政局有“公车户口”，财政局在每年编预算时，要把每辆车的经费拨足。一类是“非财政养”的公车，这种车的购车费用来源可能五花八门，如有本系统上级机构为了开展一些业务而下发的车辆，这类车财政局是不养的，即使养也只是象征性地给一点，



CFP供图

这类公车经费主要是自筹。

还有一类就是无法拿到台面上说的，在有些部门，相关企业事业单位可能会借车给他们用，而且费用“全包”，如办好保险，送加油卡。这往往成为官员“有本事”的标志，一般的“弱势部门”是没有的。叶青将这一类称之为“社会上养的”公车。

把“公车的口径”说清楚了，“某县”的公车经费就会有3个数字：一是财政预算上的养车费用；二是各单位养车预算加上单位自筹的养车费用；三是预算养车费用加上单位养车费再加上“灰色养车费”。这种“灰色养车费”可能会出现在各种报销凭证之中。

由于统计口径不统一，迄今各方乃

至中央并没有完整准确的公务用车数据。

2011年，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公布北京市的公车数量，截至2010年年底，北京市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含区、县、街道、镇)公务用车实有数为6.2万辆，其中市一级公车2.09万辆。

但北京晒公车的做法没有引起其他地方的仿效。虽然在同年5月，中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专项治理领导小组要求各地自查自纠，并对公车逐辆登记，不允许遗漏、瞒报，以彻底摸清车辆总数，然而清查结果却始终没有发布，只在一年后透露了两个数据：中央国家机关本级一般公务用车压减达35%，全国共清理出违规公务用车19.96万辆。

湖北秭归创新扶贫模式

扶贫开发从“个人独奏”变为“多部门合唱”

本报记者 辛明

如何挑战贫困，推进共同富裕？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湖北省秭归县摸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1119”整村推进工作模式：由一名县委常委或人大、政协主要领导挂帅，一个主要单位牵头，一家规模企业结对共建，9个县直单位集中帮扶一个贫困村，一年一轮换。以往扶贫办的“个人独奏”变为“多部门合唱”。

“1119”帮扶模式充分发挥了县领导的带头作用。2011年，9个整村推进村整合资金4200多万元；2012年，9个整村推进村整合资金5908万元；2013年，10个整村推进村整合资金7155万元；2014年，10个整村推进村整合资金8112万元。资金整合量逐年增长，为贫困村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天鹤村摘掉了“贫困帽子”

时光回到2011年，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启动实施。

如何推动扶贫工作的新局面，秭归县扶贫办创新实施了“1119”帮扶工程，在全县确定了48个贫困村实施整村推进重点帮扶。这些整村推进重点帮扶村，都是经过县乡两级严格把关审核推选出来的。各村先向乡镇申报，然后由村所在乡镇召开会议确定帮扶村，报请县扶贫办审核，最后报县人民政府审定，由一位县领导挂帅，11个单位共同组成帮扶专班。

该县正是通过“1119”这一硬举措，唱好了整村推进的“重头戏”。

县委书记刘清华要求，各帮扶单位要“各炒一盘菜，共办一桌席”，不能还是扶贫部门的“个人独奏”，要做成全县各部门联动“大合唱”，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履行帮扶责任和任务，帮助贫困村和困难群众脱贫致富。

“要致富，就养猪”，近年来在天鹤村成了流行语。天鹤村位于杨林桥镇的半山山上，过去苦于没有主导产业，农民增收无门。2011年实施整村推进，因为该村是玉米作物产区，加之地势相对平坦，容易建猪栏。由此确定将生猪作为主导产业，全村大力发展生猪养殖，投入扶贫资金70万元，扶持480户发展，其中扶贫对象128户，覆盖面占扶持对象的64%。

秦朝林是一位精明能干的80后小伙子，前几年和妻子一起在温州打工，从事物流业，年收入达10万元。前年政府鼓励该村发展生猪养殖业，他们毅然回到家乡准备大干一场，第一期投资50万元建猪栏800平方米，今年又投资30万元建了猪栏500平方米，同时建设配套的沼气池1个，水池1个，排污化粪池3个，引进种猪50头，现存栏300头，预计今年出栏在500头以上。

税元龙是天鹤村第二村落的居民，家里主要靠着3亩多地，种点玉米、油菜，一年收入不足1万元，根本无法满足全家4口人的生活需要。考虑到他家的实际情况，村里将他作为整村推进扶贫对象进行帮扶，指导他发展生猪养殖，补助4000元用于建猪圈，并免费提供4头种猪。当年，税元龙出栏生猪37头，盈利近4万元，一次性收回了建猪栏的投资。“这个产业是发展对了，如果错过了整村推进的机会，我就亏大了。”税元龙边回忆边说，“如果没有‘1119’工程，我现在可能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年挣这么多钱，那在以前种包谷的时候做梦都不敢想。”

在养殖大户的带动下，像王勇、税元龙这些贫困户在政府扶持下纷纷跟进，去年出栏100头以上的大户18户，年收入七八万元，出栏50头以上的有50多户，年收入三四万元。天鹤村一跃成为全县第一大生猪养殖专业村。

天鹤村村支书林文应介绍，以前村里没有主导产业，645户村民增收无门。“1119”工程实施期间，村里把生猪确定为支柱产业，天鹤村逐渐发展成为全县第一大生猪养殖村。去年户均增收6500元，贫困村的“帽子”摘掉了。

一项支柱产业，是一方农民稳定增收的来路。秭归县在新一轮扶贫开发整村推进过程中，将产业开发作为核心。当然，培育一个主导产业，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少则三五年，多则七八年，贵在持之以恒。2011年全县9个贫困村实施整村推进，有5个村选择的是茶叶产业，两个村选择的是柑橘产业，两个村选择的是生猪和蜜柚产业。

近两年，全县将80%的财政扶贫资金用在发展产业上。2013年启动整村推进的9个贫困村，安排产业发展资金高达752万元，郭家坝镇罗家坪村将100万元的财政扶

贫资金全部用于发展茶叶。九畹溪镇九畹堂村，砚窝台村，泄滩乡徐家山村、黄家山村按照“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扶贫模式，坚持集中连片发展茶叶，建立了农民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2011年以来，全县通过实施新一轮整村推进，共发展以茶叶、柑橘、核桃为主的经农林15000亩。

县委书记的“亲戚”

家住归州镇周家湾村的吴承福和县委书记刘清华是新的“亲戚”，他家种了800多棵脐橙，基本都是县里正在逐步淘汰的普通罗脐。刘清华到他家的果园看了以后，建议他进行品改。

吴承福说，看着别人的新品种挣了钱，他前两年已经改了100多棵中华脐橙，也已挂果。但盖新房后欠债8万多元，资金周转不过来，现在进行品改还差3000元。刘清华当即表示：“按规定，县里精准扶贫专项资金给你补2000元，剩下的1000元我个人给你补齐，另外再帮你协调建一个蓄水池，解决灌溉用水，不过田间管理就要你自己下功夫了。”

“我准备把800棵树全部改成中华脐。果树品改三五年进入丰产期，最多5年，我就可以还清所有债务。”吴承福对未来充满信心。

在县里的交流会上，刘清华与大家分享了“结穷亲、一帮一”的经验：“多到‘亲戚’家走动，多和他们聊天，了解他们最迫切的需求；他们缺什么，我们就扶什么。这样，彼此的心就会越来越靠近，感情也会越来越深。”

“脚上无泥，手上无力。”秭归县扶贫办为解决贫困户反映的实情，进行了广泛调研，问计于老百姓。为落实扶贫到户、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秭归县改过去的“大水漫灌”为“滴灌”，打破平均主义和“一刀切”，实现对贫困户的精确瞄准、定点清除。后来，试点总结出符合贫困村、地区的差别式扶贫到户模式，即根据农户不同的贫困原因，采取不同的扶贫措施；根据农户不同的贫困程度，实行不同的扶贫标准。

今年，秭归县根据精准扶贫的新要求，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全县确定500多户为精准扶贫对象，要求全县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一人帮扶一户，全县上下总动员。这

些户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还比较困难，但只要伸手帮一把就能“站起来”。帮扶干部登门过问，实地了解情况，上门与他们“结穷亲、一帮一”，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配套、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在资金和项目上给予倾斜和扶持。这些户可以享受县里2000元的扶贫专项资金补贴，帮扶干部再拿出一定的扶持资金，将他们反映最强烈、最紧迫、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落实好，帮助他们理清发展思路，制定家庭脱贫计划。

目前，秭归县累计投入差别式扶贫资金1100多万元，实施差别式扶贫到户项目145个，涉及产业发展、“一建三改”、危房改造等六大类。受益差别式扶贫的农户达6890户，且80%以上的农户有了稳定增收的致富项目。

“要想富，下山住”

“要想富，下山住。”在盐关村，人们都这么说。

村里有一个叫王家坊的自然村落，100多户人家，散落在半山山顶上，过去受制于恶劣的自然条件，村子里非常穷，十里八村都叫“有女莫嫁王家坊”，这里曾流传着“窝棚似的房屋多，鬼不上门；吃红薯度日的人多，贼不上门；男人打光棍的多，女不上门”的民谣。

在整村推进工作中，该村抢抓政策机遇，通过国家政策扶持和发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省道秭兴路为轴，在半山腰新修公路8公里，并完成了硬化。为从根本上改变高山山区群众恶劣的生存环境，村“两委”紧紧抓住扶贫搬迁的机遇，积极引导村民搬迁下山。通过科学论证和统一规划，确定以条件相对较好的王家坊新修公路沿线为“福平”(福平来源于扶贫的谐音)搬迁居民点。“福平”小区于2006年开始启动实施，计划安置搬迁农户78户，302人，已搬迁安置68户，265人。按照标准图纸建造的68幢楼房一字儿排在公路两侧，掩映在翠绿的橘树林中，过去荒凉的地方呈现一片新农村景象。

生存环境恶劣、生产资料匮乏，是贫困户脱贫的最大障碍。搬迁是解决他们脱贫的根本措施。秭归县整合扶贫搬迁、危房改造、生态移民等政策性资金，大幅度提高贫困户农户搬迁建房补助标准。结合整村推进和新农村建设，按照“大分散、小集中”的原

则，兴建一批特色鲜明、功能配套、规模适度的“福平”居民小区。目前，秭归全县共建成棋盘岭、朝东观、堰塘坪等扶贫搬迁居民点27个。

两河口镇堰塘坪村“福平”居民小区是2012年启动建设的。10月15日，在该村“福平”居民小区内，村民胡兴海正在将烘烤后的烟叶进行分类。

一排排整齐的两层小洋楼，静立于胡兴海的身后，墙面白净，室内的地砖也一尘不染。去年，他们一家三口还住在海拔1500米的高山上，交通阻塞、信息闭塞，没有什么支柱产业，一家人的生活极不便利。现在搬到“福平”小区后，配合村里整村推进安排发展烤烟，一年能有五六万元的纯收入。

“这里居住着30户118人，都是从高山上搬迁下来的村民。”村支书李德余在“福平”小区内介绍说，“每户居民政府扶持1.2万元，实施规划‘一张图’，建设‘一盘棋’。”

近年来，秭归因地制宜地探索出“能人进镇，贫困户下山坪的梯次安置模式”、“政府做媒，牵线搭桥的插花安置模式”、“统筹规划，兴建小区的集中安置模式”、“广泛联络，投亲靠友的外迁安置模式”，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在全省率先将搬迁扶贫人均补助翻一番，让这些祖祖辈辈居住在穷山沟里的人下山奔小康。

6年来，全县共实施扶贫搬迁、危房改造4978户，有16878人住进了新居。

扶贫搬迁不仅帮助贫困老百姓脱离了困境，也搬出了一个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新农村。

在集中安置居民点，秭归县委县政府坚持规划先行，对居民点内的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配套到位。大力实施“一建三改”工程，有效解决农村脏、乱、差的问题，提升农村整体形象。让农民“建得起、住得下、稳得住、能致富”，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美好幸福家园。

实践探索起到了“点燃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作用。居民点农户配套水冲式卫生间，吃上了自来水，安装了太阳能，有线电视，扶贫搬迁成为一项实实在在的惠民工程、民生工程，让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进一步提升，干群邻里关系更加融洽。

“1119”帮扶模式解决了真扶贫的问题，差别式扶贫解决了扶真贫的问题。扶贫政策瞄准能力的大幅提升，使贫困户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扶持，让扶贫的意义体现得更加充分。与此同时，秭归县更加注重对贫困户脱贫能力的提升，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帮助贫困户增添脱贫信心，增强自我造血功能，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秭归的扶贫开发也不再是扶贫部门的“独奏”，而是演化成全县干部群众的集体“大合唱”。

和繁忙程度。

叶青说，有媒体报道中提到一位家住北京西三环的某部委的李司长，自己开车上班的路程约7公里，他一个月的油费约1387元。车改后补贴1300元，基本上够上下班。实际上，不应该把上班的远近与车补数额联系起来，这会误导车改。

叶青表示，从“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这一条中，可以揣摩到，改革方案对上班的费用这一点采用了淡化处理的方式。其原因，一是公务人员上下班远近情况千差万别，有的住在10公里之外，有的拐个弯就到了办公楼，无法加以考虑。二是上下班属于“八小时之外”，不在“公务交通”的范围内。三是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公共交通、道路都会越来越完备，自行解决困难应该不大。四是从其他国家的情况来看，多数国家对此是不考虑的，也有少数国家加以考虑，就是每个月要填报居住地点，财务部门计算驻地到办公地点多种交通方式的不同费用，加以平均计算。由于我国处于车改的初期，要这么细化，还是有困难的。

沈荣华告诉本报记者，10月19日，财政部公布了修订后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规定中央在京单位工作人员到远郊区开展其他公务活动且实际发生住宿、伙食、交通等费用的，按照差旅费管理规定的规定标准报销。到驻地以外参加会议、培训的，会议、培训期间执行会议和培训费的相关制度。往返会议、培训地点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按照差旅费管理规定的规定报销。

“这就是为了和公车改革做好衔接。”沈荣华说。

长白山林海里的夫妻警务室

管清江 孙婕妤

鸭绿江畔，吉林省临江市六道沟镇宝山社区里鸡鸣犬吠、车来人往，一片平安祥和的景象。“咱宝山能有这么好的治安和生活环境，是因为咱有‘夫妻警务室’这个镇山之宝！”一位村民这样说。

2007年年底，吉林省公安边防总队宝山社区成立了吉林省首个夫妻警务室，民警宁忠伟和妻子李丽从此担起了宝山560平方公里辖区保平安促稳定的任务。

夫妻警务室条件十分艰苦，先后5次更换办公和住宿地点。今年8月，宝山社区党支部腾出两间办公室给了他们，一楼的一间用来办公，二楼的一间用来住人。宁忠伟在二楼走廊把头顶了个水龙头当洗手间用。简陋但不能称其为家的家，一名民警和一名不拿一分钱薪水的名誉辅警妻子搭起了夫妻警务室的平台。

2012年7月初，错妻子于连续发生多起摩托车失窃案件，辖区群众人心惶惶。宁忠伟与妻子李丽分头行动：宁忠伟组织青年壮年村民到村子附近的树林搜查，妻子李丽发动村中妇女挨家挨户宣传防盗常识，搜集破案线索，相继找回4辆被盗摩托车，挽回经济损失两万余元。

“提高见警率，老百姓经常看到我们的身影心里就有安全感。”宁忠伟说。宝山社区的5个自然村分散在长白山林海腹地的沟沟岔岔里。“为了方便工作，所里给我配发了两辆警用自行车，但很快就骑坏了。接着所里又给我增配了一辆，但也没骑多久。考虑到情况特殊，所里又给我配了第三辆。”宁忠伟说，“后来我舍不得骑这辆自行车，常常搭乘过往车辆走访，货车、卡车、拖拉机都坐过，牛车也坐过的新农村。”

在集中安置居民点，秭归县委县政府坚持规划先行，对居民点内的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配套到位。大力实施“一建三改”工程，有效解决农村脏、乱、差的问题，提升农村整体形象。让农民“建得起、住得下、稳得住、能致富”，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美好幸福家园。

实践探索起到了“点燃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作用。居民点农户配套水冲式卫生间，吃上了自来水，安装了太阳能，有线电视，扶贫搬迁成为一项实实在在的惠民工程、民生工程，让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进一步提升，干群邻里关系更加融洽。

“1119”帮扶模式解决了真扶贫的问题，差别式扶贫解决了扶真贫的问题。扶贫政策瞄准能力的大幅提升，使贫困户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扶持，让扶贫的意义体现得更加充分。与此同时，秭归县更加注重对贫困户脱贫能力的提升，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帮助贫困户增添脱贫信心，增强自我造血功能，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秭归的扶贫开发也不再是扶贫部门的“独奏”，而是演化成全县干部群众的集体“大合唱”。

有的村民一天到晚无所事事，还有养的养成赌博、酗酒毛病。为改变这种状况，宁忠伟找到宝山村村委会，在村委会成立了文化大院和图书阅览室，然后又找辖区企事业单位捐赠一批养殖和种植的科技书籍。

“小猫小狗扰民，群众骂街，夫妻吵架，散养的家畜毁别人庄稼，问题虽小，但处理不好就会酿成大祸。”宁忠伟说，有一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二人刚要动筷子吃饭，辖区群众孙女士打来电话，说丈夫打她，她不想活了。放下碗筷，宁忠伟和李丽急忙赶到孙家，饿着肚子劝解了4个多小时。孙女士两口子和好了，宁忠伟和李丽饿着肚子披星戴月回到警务室。“这两口子真不简单。”宝山社区的人称赞说。